

懷孔德

紀果庵

「孔德，孔德，他的主義是什麼？」

是博愛，

是尋求人類的真理，

是保守人類的秩序……」

以上是孔德學校的校歌，這些日子，頭腦裏總是盪漾着這隻歌的清脆聲音。那一定是每週的星期一，在孔德中部院落的大禮堂中，中學部和小學部都聚在一起作週會的時候，唱完黨歌之後，便是這個歌了。另外還有一首，是以「我們的北河沿」起頭的，不常唱。回想別離可愛的孔德，不覺匆匆十年，去年回北京，看見昔日小學的學生，已有不少人在大學作事，我們正是不知不覺的老去，看着幼小的長大，雖然也喜悅，實在還是哀悵得很。在苦雨齋中，也看到好幾位孔德的老同事，大家提起當年，連素來不甚相熟的人也立即有一番親熱，孔德好像成了我們友誼的紐帶。自己大學畢業以後，經過的事情也很少了，但孔德的生活，却永遠比別的印象更深，那可以說是一連串有趣味有色澤的日子，一大片有景物有繁華的環境。……有一天看到當時主持着小學部的老友王淑周，他的大少爺已經娶妻生子，我們的境界和心情也就可想而知。由他的述說，知道今日之孔德也像受了創傷一樣，荒涼，窮困，拮据，絕對沒有往日的豐采與情味了。我不免想到那紅色的門，綠色的窗，有美麗的花壇的院落，有紫藤的夏蔭，與那些道不出姓名的永遠可愛的面孔。但是當我路過東安門大街時，

只見什麼東興樓在對面修禮堂了，南河沿的翠明莊多麼堂皇富麗，新擴充的柏油路多麼寬闊，而只有孔德是老了，錢玄同先生手書的照壁上的總理遺囑，和註有國音及羅馬字的馬叔平隸書的校名都剝落了，雖然沒有進入學校，可是心裏的沈重已經使我不能忍受，東安門的紅色拱門在那裏呢？常常在大街兩旁釘皮鞋的老匠人在那裏呢？我常常去理髮的那小店在那裏呢？在冬天，垂滿了冰箸的啞啞的水車爲什麼不見了呢？南池子的樹蔭好像都變了顏色，真的，整個北京好像都和我生疏了，不親熱了。

這裏我要說明，雖然錢玄同先生在致周知堂先生的信裏把孔德喚作「丘道」，（見知堂先生支同紀念引）但只是爲了猜謎，實在孔德乃是法國社會學家 Comte 的名字，所以學校的名字也就譯爲 *École de Comte*，（在照壁的校名下也有這一行法文的）一個最不多烘的學校，却取了頂多烘字樣的校名。不知底裏的人，一定莫明其妙。她是屬於中法大學系統，中法共分四學院，都是以法國的著名學者爲名的，文學院曰服爾德學院，即 *Voltaire* 之名。理學院曰居禮，發明鐳鏡的，大家都知道。陸謨克學院乃是生物學家 Lamarck 之名，另外一個就是孔德學院了，顧名思義，自可知其爲專研社會科學者。但孔德學校的歷史，却長於孔德學院，故大家常以孔德學院爲孔德學校的繼母。孔德是無所謂高初中的，自幼稚園起，小學六個年級，中學四個年級，大學四個年級，初中一叫作七年級，大學一叫作十一年級，這是非常特別的，差不多從幼稚園入校，一直可以到大學畢業，而到里昂或巴黎去留學，不必再考什麼入學試驗了。他們念的是法文，英語只作第二外國語，大約不是自立系統，升入別的大學也是困難的。

誰也想不到孔德的校長乃是蔡元培先生，他是終年不會到校的。孔德可以說和北大的夙命的相連繫，學生，北大同仁的子弟；教員，北大的教授或學生。當我進孔德的時候，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從前任課的幾位前輩，沈尹默先生，馬幼漁先生，周豈明先生，張鳳舉先生，徐祖正先生，錢玄同先生，沈兼士先生……等，都已經去作政府的高級官吏，或在大學裏主持着頂重要的科系。剩下的只有研究中國小說史的馬隅卿先生（廉）他在管着全校事務，名義好像是總務長罷，還有陳君哲先生，仍然教着高級班的國文，衛天霖先生，教着美術，陶虞孫先生教音樂和生物，趙蔭棠先生教國文。去年看到趙先生，真是老得多了，拿着短小的旱烟管，說話還是那麼有風趣。可是，雖然那些老先生是離開了學校，但在精神上仍然有很密切的關係，譬如錢玄同先生，一直到廿七年逝世為止，總是寄宿在學校裏的，那個紫藤的小院落，陰陰的，兩間小小的東房，緊鄰就是不修邊幅的王青芳先生，我幾乎每天都在孔德的大門附近遇到錢先生拿着手杖和破黃皮包去大學上課，他連包車都沒有，出門現雇。魯迅先生兩地書第一二六函云：「塗次往孔德學校，去看舊書，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嘮叨如故，時光可惜，默不與談。」不知迅翁爲什麼和錢先生不對，此所云金立因，分明是指錢公。我們同學對錢先生都是很恭敬的，我在「師友憶記」裏也說到過。兩賢相惡，或許自古已然。唯玄公與迅翁乃是在東京小石川町同時聽太炎先生講說文解字的同門，似乎不該如是同室操戈耳。知堂先生玄同紀念云：

「關於玄同的思想與性情欲有所論述，這是不容易的事，……我只簡單的說在聽到凶信後所得的感想，我覺得這是一個大損失。玄同的文章

與言論平時看去似乎頗是偏激，其實他是平正通達不過的人，近幾年和他商量孔德學校的事，他總是最能得要領，理解其中的曲折，尋出一條解決的途徑，他常談諧的稱爲貼水膏藥，但在我實在覺得是極難得的一種品格，平時不覺得，到了不在之後才感覺可惜，却是來不及了，這是真的可惜。老朋友中間玄同和我見面的時候最多，講話也不拘束而且多遊戲，但他實是我的畏友，浮泛的勸誡與嘲諷雖然用意不同，一樣的沒有什麼用處。玄同平常不務苛求，有所忠告必以諒察爲本，務爲受者利益計，亦不泛泛徒爲高論，我最覺得可感。……」由這些話可以知道知堂翁與玄同翁對於孔德學校關係之深，且大可了解玄翁之爲人，我們會和錢公受過業的殊有同感。孔德有一時期全由尹默先生在背後主特，後來就轉入周先生名下，大家都稱周先生爲周二先生是也。關於孔德內部的問題，那我是不能贊一詞的，學校規模一大，有點嚙嚙嘖嘖，也許免不了，但無論怎樣，孔德總是整個的，活潑的，前進的，朝氣的。尹默先生負責時的主持人即馬隅卿先生，馬先生爲馬氏兄中之最幼者，幼漁先生，叔平先生，大家通曉得的，這位九先生專治中國小說史，不登大雅文庫起初或即指馬公自己辦公的那兩間房，位於孔德中部的高台上，前面種了不少的花木，我們天天在那廣大的磚台上上課開操，我初到孔德時，他正以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的名義印着清平山堂話本，這時還沒有得到馮夢龍原著的四十四本平妖傳，故尙無平妖堂之名。前面魯迅先生所說的經孔德看舊書，亦即指此，唯孔德之舊書，又不全在馬公平妖堂中，另有十幾大間用厚重的城磚築成的書庫，原是清宗人府放置玉牒的地方，這兒藏滿種種珍本，而小說戲曲尤多。有名的插圖本崇禎刊金瓶梅亦在其中，與北大所藏及北平圖書館的萬曆本

可以鼎足而三的。此項藏書自然要感謝隅卿先生的搜羅之功，每天每天背着藍布包袱的書友們在孔德的紅大門內外徘徊着，於是書庫一天天豐滿起來了。但在早期的孔德，聽說蔡先生，沈先生，以及知堂先生都會買過不少書的，並且有許多是由冷攤得來。所以，當民國十九年，學校爲了買書墊款太多，政府津貼又斷，因而發不出薪水時，我在物質上雖然困苦得不能言喻，而精神上則確是分毫無怨思都沒有，蓋下意識的對於學校有着不可動搖的敬意之故。馬先生不唯在書的收藏上使孔德造成特殊地位，就是在精神的奮鬥上也曾爲孔德賣過不少的氣力。他如存在，年歲也不過五十歲罷，可是終於死在北大的小說史課上，而因爲「身後蕭條」的緣故，平妖堂的珍品也全數售之北大了。苦茶隨筆中有隅卿紀念一文，可以作爲我所說的參考，引抄於下：

……與隅卿相識大約在民國十年左右，但直到民國十四年我擔任了孔德學校中學部的兩班功課，我們才時常相見。當時係與玄同尹默包辦國文功課，我任作文讀書，曾經給學生講過一部孟子，顏氏家訓，和幾卷東坡尺牘。隅卿則是總務長的地位，整天坐在他的辦公室裏，又正在替孔德圖書館買書，周圍堆滿了舊書頭本，常在和書買交涉談判，我們下課後便跑去閒談，雖然知道妨害他的辦公，可是總不能改。除我與玄同以外，還有王品青君，其時他也在教書，隨後又添上了（魏）建功（徐）耀辰，在一起常常談上半天。閒談不夠，還要大吃，有時也叫廚房開飯，平常大抵往外邊去要，最普通的是蒜蘆，一盃一，後來又有玉華臺。民十七以後移在宗人府辦公，有一天夏秋之交的晚上，我們幾個人坐在屋外高台上喝啤酒汽水談天一直到夜深。說起來大家都還不能忘記。但是光陰荏苒，一年一年地過去，不但如此盛會，於今不可復得，就是那時候大家的勇氣與希望，也已消磨殆盡了。隅卿多年辦孔德學校，費了許多的心，也吃了許多的苦，隅卿是不是老同盟會，我不會問過他，但看他含有多量革命的

熱血，這有一半蓋是對於國民黨解放運動的響應，却有一大半或由於對北洋派專制政治的反抗。我們在一起的幾年裏，看見隅卿好幾期的活動，在執政治下三一八時期與直督軍時期的悲苦與屈辱，軍警露刃迫脅他退出宗人府，不久連北河沿的校舍也幾被沒收，到了大元帥治下好像疔瘡已經腫透離出毒不遠了，所以減少沉悶而發生期待，覺得黑暗還是壓不死人的。奉軍退出北京的那幾天他又是多麼興奮，親自跑出西直門外看嫻嫻其來的山西軍，學校門外青天白日旗恐也是北京城裏最早的一張吧？光明到來了，他回到宗人府去辦起學校來，我們也可以閒談了幾年，可是北平的情形愈弄愈不行，隅卿於二十年秋休假往南方，……廿二年冬他回北平來專管孔德圖書館，那時復古的濁氣又瀰漫了中國，到廿四年春他就與世長辭了！孔德學校的教育方針向來是比較地解放向前的，在現今的風潮中似乎最難於適應。……不過隅卿早死了一年，不及見他親手苦心經營的學校裏學生要從新男女分了班去讀經作古文，使他比章士釗劉哲時代更爲難過，那也可以說是不幸中之大幸了吧？

我抄上這麼一大段文字，無非使看官可以多明白一點孔德在故都的學校裏占什麼地位，而馬隅卿先生又在孔德中占什麼地位。我只是孔德的一員小卒，對於大的節目，當然不甚曉得，當初讀了此文，也不免生了「原來如此」的感覺。馬先生去整整十年了，那穿着深藍色西裝黃色高腰皮鞋的影子，如今還是鮮明得很。民國十九年夏天，我是寄寓在孔德學校的，前文所說高台上的吃汽水高談闊論，常常看到聽到。唯玄同先生聲音最高，容易使人記憶耳。我離開孔德是二十二年，袁良市長的強制男女分班及讀經古文等節目幸未趕上，在孔德的風習上說起來，這確是加倍痛楚的。作爲孔德風之最大特色，即知堂翁所云的解放與向前。譬如中學男女合班，殆即由此興起。我們不妨說當新青年與新潮時代思想勃發之際，除去北大以外，第二個實驗場所即是孔德。在孔德作教師掀起面孔是絕對行

不通的，男孩子女孩子永遠那麼天真，一進大門就有人抱住你的大腿或脖子，如果穿了新衣或新剪了髮，先得挨學生的打，叫做「打三光」。諺曰：「剃頭打三光，不長虱子不長瘡。」先生們大都是含笑承受這打與頌禱的。在雪天，會有人在衣領裏塞進一團雪球，但這冰冷却使人心口溫暖，這些在優美家庭中長養起來的純潔國民，沒有受過一點不良傳染，我們應當被他們的稚氣的愛所感動。他們向來不鬧什麼風潮，也並沒有外人所預料的那麼多不大高明的羅曼斯。在這裏我們認識了一個優良家庭環境與高尚的學校風氣之重要，當我闊別孔德三四年之後又帶了別校的學生去參觀時，遇見幼漁先生的幼子馬泰，長得是那麼高了，還是過來抱住脖子，很熱烈的叫着：「紀先！」（他們的慣例是省去「生」字的）於是我立即沉在往日的夢境了。

因為思想上的啓迪，孔德學生的作文乃是另成風氣的。我會負責整理過孔德從前的國文講義，印刷校訂皆甚精好，亦即知堂先生等主持國文課時所選刊者。大約一般學校還在讀着商務出版的國文讀本評注之時，孔德已經讀顯克微支的小說了，至於狂人日記，吶喊等篇更毋庸提。我在小學部教讀時，取材常是朝華夕拾和空大鼓，但學生們往往撇着嘴和我說：「早看過了，先生選點別的好不好。」這便令讀書很少的我爲難了，對小孩子們選些什麼教材呢？在中國，兒童文學是不存在的。僅有的紡綸故事呀，兩條腿呀，小約翰呀，統統是陳腐的了，安徒生童話也看過了，儘是公主和王子的老調子也不行。有一時期學生頗迷戀於大仲馬的俠隱記，孩子們把木劍帶在腰上，人人都要做起達唐安來了。也有學生喜歡看波斯頓和屠場那類厚重的東西，他們並不覺得格格不入。孔德自己刊行的孔德校

刊，是把學生的作文成績作基本稿件的，絕不像普通中學學生之濫調與庸俗，可是在先生出作文題時，也真是難關，無論在黑板上寫出多少題目也不能對了學生的心理，終於還是自家想了自家的題材。若是說解放，此亦其一端。然而中國的事難說的實在多，到現在還是盛行着「人生兩大之間」或「美麗的雲兒向我微笑了」的句法與套子，似乎較之桐城義法，更遜一籌，和教師及學校當局提起改良讀書和寫作的方法，也只有付之耳邊風了。於此懷想所謂「孔德風」，便有更深的悵惘。

去年回北京在市場看書攤，忽然見到一冊光社年鑑，（註）翻開看看，乃是劉半農先生送給馬幼漁先生者，寫着「幼漁二哥」的字樣。裏面有好幾幅孔德學生的照片，是李召貽先生攝的。（這些孩子現在都在那裏呢？）雙鳳風磚齋主人與孔德的因緣很深，兩位雙生的公子小姐育倫育敦（在英倫所生）都是孔德的學生，公子育倫是大有父風的人物，我會教過的。天華先生的孩子也是孔德學生。這冊子在別人看起來很平凡，但在我們大有興趣，只花了五塊錢即買妥，回到家中細閱，正是舊曆除夕，北京雖是故鄉，而自己的家庭却遠在江南，一盞燈，一個人，寂寞而淒清，不免提起筆來在扉葉上寫了一段感傷的話，現在書不在手邊，也倒記不清是什麼了。只是覺得這十年的歲月，是怎麼樣可驚！田園寥落平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骨肉田園，固早不在話下，舊遊之地，同門師友，何一不可繫人夢思！而且許多苦難，也還來日方長，若真的後之視今，亦如今之視昔起來，則此種無謂的個人主義文字，亦未嘗不可作來者嘆息之資也。

（註）光社乃劉半農先生所組織之業餘攝影團體，其年鑑爲中國美術攝影集之嚆矢，亦值得紀念者也。